



精准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

□ 糜万山 贾晓磊

1月2日，习近平主席签署中央军委2020年1号命令，向全军发出开训动员令，要求全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突出以战领训，突出体系练兵，突出对抗检验，突出打牢基础，突出锤炼作风，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全军区队应坚决执行军委命令，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着眼解决训练领域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紧密结合军事政策制度的改革实践，尽快建立起符合能打胜仗要求的实战化军事训练体系，精准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在攻克短板、固强补弱中时刻保持戒备状态，确保随时能打仗、打胜仗。

深入探索能打胜仗的实战化军事训练理论。实战化训练必须以理论的进步与繁荣为前提。全军实战化军事训练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需要结合新的体制编制和作战任务，针对不同作战对手，研究新问题新特点新规律，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及时回答和解决训练中的重大问题，引领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正确航向。应采取军种与战区结合、部队与院校结合、机关与科研机构结合的方法，加强基础性和应用性理论研究。深入研究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理论，把敌情、我情、战场环境搞透，把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搞透，把不同战略方向遂行任务所需要的能力搞透，把各参战部队的基本战法、协同方法和综合保障搞透，为实战化军事训练提供需求牵引；深入研究军队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理论，厘清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部队管理、后装保障等的关系，为实战化军事训练提供理论支撑；深入研究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本质特征、任务路径等基本问题，切实弄清在新体制下，不同战区、不同兵种部队的训练内容怎么改、训练方法怎么变、训练条件怎么建、训练管理怎么办，为部队实案化训练、使命课题专攻精练、应急应战训练提供理论牵引。

始终坚持能打胜仗的实战化军事训练原则。练兵备战必须紧贴时代的发展变化，着眼能打胜仗的需要，根据人员素质、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的发展变化，坚持一系列的原则要求。比如，着眼国家安全和形势，始终坚持训战一致，紧贴军事斗争准备任务训练，“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真正把用和练兵统一起来。比如，充分发挥广大官兵主体作用，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坚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与调动官兵积极性的有机统一，尤其要抓好群众性练兵比武，把每个单兵、每一型装备、每一类作战要素训到位。比如，依托国家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适应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始终坚持融合发展，确保在训练场地征用、物资经费保障、军事人才培养等方面充分利用地方资源。还比如，大力加强训练作风建设，始终坚持求真务实，深查实纠过日子的和平思想、低层次徘徊的练兵状态、束缚练兵动力的机制套路、过度拔高的安全标准等顽症痼疾，科学确定训练目标和具体任务，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组织训练，切实锻造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确保广大官兵敢于战胜一切困难，敢于压倒一切敌人。

不断创新能打胜仗的实战化军事训练内容。训练内容历来是训练领域最活跃的因素，创新实战化训练内容是推动训练发展的核心。纵观人民军队军事训练发展的历史，不同时代的训练内容，无不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战争形态和作战形式；而战争形态或作战形式的重大变革，又会很快在军队的训练内容中体现出来。因此，在设计理念上，应由指令性为主转为指导性为主，创建适用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动态发展的训练内容体系；在构建方法上，应由自下而上转为以上带下，以创新联合训练内容带动诸军兵种训练内容的改革，以深化合同战役战术训练内容改革带动兵种专业训练内容的充实完善；在发展模式上，应由周期性换代转为滚动式更新，根据作战任务变化，适时调整和科学组合训练内容，确保训练内容真正适应“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的需要，适应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需要，适应各战略方向执行不同作战任务的需要。

积极发展能打胜仗的实战化军事训练方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战斗力生成模式，基于网络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成为战斗力的基本形态，战争由信息化向智能化快速发展，人的科技素质在战斗力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训练方法手段必须与战斗力生成模式相适应，改进组训方式，增大科技含量，使之成为推进训练发展的“倍增器”。应以联合训练为主轴创新部队训练方式，探索符合不同战区作战任务、部队分军种建设和武器装备多代并存的多样化组训方式，保证军事训练的整体推进。以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为重点创新院校教育方式，充分发挥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的育人功能，构建分工合理、衔接配套、全程培养的培训模式。以高效复合先进为目标创新训练手段，建立健全基地训练、模拟训练、网络训练的法规制度，完善使用机制，逐步扩大应用范围，尤其要突出对抗性，围绕指挥对抗、

实兵对抗、体系对抗创新方式方法，突出检验性和实战化，完善检验评估体系，实际检验作战概念、作战方案、作战指挥和作战力量。

全程强化能打胜仗的实战化军事训练保障。实战化军事训练保障具有高投入、高技术、高效益的鲜明特点，保障内容、形式、手段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训练对保障的依赖性更强。推动训练保障向主动型转变，加强训练保障的需求测算、规划计划和效益评估，增强保障的主动性；政治、后勤、装备保障要把思想聚焦到打仗上来，主动靠拢军事训练，在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和供应方式上下功夫。推动训练保障向科技型转变，发展军事训练信息系统，加大模拟训练手段建设力度，构建全军互联互通、安全稳定的网络练兵平台，积极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训练领域的广泛运用，为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提供条件支撑。推动训练保障向集约型转变，加强量化管理分析，精确掌握保障信息、精确提供保障资源、精确运用保障力量，做到适时适地适量准确保障。

健全完善能打胜仗的实战化军事训练管理。实战化军事训练与过去相比，训练内容和组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训练组织管理模式面临诸多挑战，迫切需要依法科学管理，迫切需要对训练各要素、各环节、各层次进行精准管控。完善训练法规体系，科学梳理现行训练法规，复杂的要简化，重复的要合并，不够用的要补充，不好用的要改进，不管用的要废止，健全完善实战化军事训练法规体系。创新精细管理手段，改变人工管理为主、定性分析为主、按级监控为主的传统训练管理模式，发展信息化的训练管理手段，深化训练管理综合网建设，加大训练管理软件开发力度，推动军事训练信息向即时、同步、共享方向快速发展，向信息化管理要效益、要战斗力。依法加强训练监管，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化依法监管意识，加强训练监察问责，通过监察、反馈、改进，再监察、再反馈、再改进的反复过程，引导部队把战斗力生成的每一个环节都训到训全训实，促进军事训练螺旋式上升、跨越式发展。



王弼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是一位革命家、航空技术专家、教育家。他与魏晋时代著名哲学家王弼同名，毛泽东曾风趣地对王弼说：我国历史上也有个王弼，和你同名同姓，他是个文人，你是个武将，你这个武的要争取胜过文的。

信念坚定，勇挑重担。王弼1899年出生于江西永修县的一个小农家庭，10岁入乡村私塾读书，他勤奋刻苦，好学上进，感动其父，遂卖地送学。1918年，王弼考入永修县立高级小学，后又考取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方志敏、邵式平等成为同学并结成好友。王弼目睹乡村百姓生活的困苦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万恶，在一群积极上进的青年学子的相互鼓舞下，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选送苏联留学，从此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革命道路。1927年9月，王弼进入列宁格勒空军航校学习航空机务工程；1933年考入苏联空军最高学府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工程系，攻读飞机与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工程，为其此后奋斗一生的航空事业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1938年，王弼奉命回国，在新疆乌鲁木齐中共驻疆办事处工作，为我党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同志补课，其间他编译了《航空发动机原理》一书，该书成为东北航校的主要教材之一。1940年，王弼辗转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培养大批空军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等意见。党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指出，“热心发展空军事业意见很好，但要有决心和耐心”。1941年，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军委航空学校，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王弼任校长。

1941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军委航空学校并入抗大，王弼担任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工程科主任兼工程大队长。1943年春，延安成立俄文学校，王弼任秘书长。3月，王弼与杨光在延安结婚，毛泽东写下“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人们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的贺词。毛泽东的贺词大大激发了王弼的革命热情，将发展新中国航空事

业视同己任，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临危受命，组建空军。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开始谋划人民空军组建事宜。王弼奉命带队赶赴东北建立航空基地，为空军的前期准备打基础、谋发展。3月30日，刘少奇接见王弼一行，指出：东北航空器材很多，中央决定派你们前去摸清情况，接收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校做准备，你们要不畏艰难。王弼临危受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坚定的革命意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王弼任政委，后刘亚楼任政委，王弼改任第一副政委。在东北航校期间，他积极配合刘亚楼的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接收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联军、国民党起义人士等一切有志于人民军队空军事业的有用人才，培养了500余名航空技术干部，为新中国航空事业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1949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军委航空局，王弼任航空局政治委员，他认真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1949年至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建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指示精神，接收各地机场、航空器材和各类航空机械厂，接收和改编原国民党空军飞行骨干，接管民航公司等。同年8月，他和刘亚楼、张学香等赴苏联商谈建立空军事宜；10月，王弼参与指挥开国大典空军阅兵飞行活动；11月，中国人民空军正式成立，王弼担任空军副政委兼空军工程部部长。1951年6月，王弼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转业地方，再立新功。1952年，王弼转业地方，出任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那时，我国航空事业一穷二白，困难重重，艰难无比。王弼亲自勘察航空工业厂址和航空学校的校址，为航空学校人才的培养、谋划等亲力亲为，制订规划，参与飞机的设计，毫无倦怠地努力工作，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杰出的航空人才。

1964年，王弼身患肺癌，但他仍然坚持带病工作，手术出院后，他立即倡议成立中国航空学会，为航空人才聚力助威。在“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王弼遭受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迫害，但他始终信念坚定，忠诚于党、忠诚事业，不顾年老体弱病重，亲自去航空工业工厂蹲

王弼：我国航空事业的先驱

□ 程宇昌

点，了解生产情况，自学英语，钻研航空工业尖端技术，一心扑在祖国的航空事业上。1976年3月，为研制高性能飞机，王弼给中央写建议书，提出抓质量、抓尖端、抓航空工业的建设，重用有造诣的航空技术专家。

1977年8月31日，王弼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1986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家·航空技术专家·教育家——忆王弼同志》的纪念文章，深切缅怀这位人民功臣、我国航空事业的先驱，称赞他是我党不可多得的航空技术老专家，是一位大公无私，不断追求进步、变革，力求我国繁荣昌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干部工作有哪些经验

□ 邱 雷

解放战争时期，战争规模空前，部队数量迅速扩大，编制体制调整频繁，我军干部工作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紧紧围绕大规模战争需要，不断完善干部工作政策制度，解决形势迅猛发展对干部的急需需求，为人民军队快速完成由抗日游击战争到国内大规模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提供坚强保证，确保人民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建立完善党管干部制度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必然选择

随着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人民军队的不断发展壮大，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抗战时期部队领导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国内革命战争的需要。全面恢复了党委制，把党管干部作为人民军队干部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保证了党牢牢地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确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战方针的贯彻执行，为赢得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党委制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一项根本组织制度。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各部队普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和支部，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党组织系统。但在王明“左”倾错误影响下，从1931年11月后，取消了红军内党的各级委员会，逐渐由党委集体领导变成了政治委员个人领导，党委制由此中断。鉴于这种情况，党的七大决定，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恢复军队中党的各级委员会。1947年7月

28日总政治部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是该部队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草案还明确了党委讨论的问题，涉及军事、政治、干部升迁调动等，并对各级党委在干部管理中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从此，党委管干部作为人民军队干部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被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务实多样的干部补充政策是人民军队大发展的关键因素

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大规模作战需要，人民军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贯彻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和以战养战、以战教战的方针，既保障了作战胜利，又使自己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干部工作紧跟战争形势发展，及时调整干部补充政策，扩大干部选拔范围，拓宽干部补充渠道，保证了部队大规模作战对干部的紧急需求，为实现人民军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提供了有力的

制度保障。

干部选拔补充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在作战中提拔干部。1946年11月23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在发给各军区各纵队首长的信中指出：“补充伤亡主要的是在实际斗争中大胆地提拔新干部。”各部队按照这一方针提拔补充干部，迅速补齐缺额。二是动员大批地方干部参军。解放战争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指出，为了打胜目前已经开始的国民党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残酷的内战，必须从地方动员抽调大批干部到部队工作。1946年，仅华中中局就安排抽调2000名踏实可靠的党、政、民干部参加部队工作。三是大量吸收知识青年入伍。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吸收接纳知识青年入伍并择优提拔为干部，指出要注意吸收知识分子、技工、医生、专门人才。1949年2月，为做好南下准备，东北野战军在平津地区就招收了1万名知识青年。四是加速改造和培养使用被俘军官。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今后凡在战争中俘获之国民党军队一切官兵均加争取，其愿为我服务者，令其服务。”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各级重视教育

俘虏，大胆使用俘虏，并规定了对不同等级的俘虏军官的处理办法。其中，仅华北军区在1948年就通过俘虏补充了3140名干部。

大规模培训干部和各类人才是确保决战决胜的重要手段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民解放军迅速发展壮大，相继扩建或组建了炮兵、工兵、通信兵、装甲兵、铁道兵、航空兵等部队，由单一的步兵逐步发展为多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各战略区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采取院校培训、教导队集训等措施，为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成千上万军政兼优的指挥员和一批又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为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证。

解放战争时期，各战略区和野战军不仅建立了军事政治大学、军政干校或随营学校，而且还相继建立了一批军兵种专业技术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各级院校始终继承和发扬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遵循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了办好院校，提高教学质量，各战略区首先选调军政素质高、管理能力强的干部担任各级院校的领导；选调既有深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干部充当教员。除了后方院校以较长时间培训人才外，野战军以下各部队都设置了教导队，短期轮训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截止到1949年9月，全军院校达到60余所，共培养军政指挥干部15万余名，专业技术人才10万余名。

锻造培育战斗精神是迅速取得战争胜利的强大支撑

全面内战爆发后，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人民军队广泛开展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三大运动，干部走在前，党员看干部，群众看党员，极大地增强了干部战士的战斗精神，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使得解放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

风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一往无前，仅用了3年多时间，就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全国性胜利。

一是开展立功运动，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各部队于1946年下半年相继开展了立功运动，提出了“在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一人立功，全家光荣”“为人民立功最光荣”等响亮口号，处处掀起了立功热潮，激发了广大指战员为争取战争胜利而英勇战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保证了作战任务的完成。二是开展团结互助运动，发扬阶级友爱精神。1946年12月，在全军推广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班长王克勤创立的“三大互助”带兵方法，在班里成立3个互助小组，在组内开展思想互助、体力互助和技术互助活动，平时互帮互学，战时实行战斗互助，对增强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三是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提高阶级觉悟。从1947年冬至1948春，各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民主整军运动，毛泽东将其概括为“新式整军运动”。干部带头诉苦，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查整，使广大指战员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以高昂的战斗激情，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英勇杀敌，不断取得胜利。历史充分证明，战斗精神培育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是人民军队必须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是强军胜战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

